

随思录

“化茧成蝶”品自高

刘根生

笔者很欣赏一句话：助推青年人才“化茧成蝶”。

王选院士被誉为当代毕昇，当荣誉加身时，他却撰文说：“不要迷信院士。”他说，自己有两次创造高峰，一次是26岁时，一次是38岁。从55岁戴上院士桂冠，自己已过了创造高峰。“在计算机等高新领域，很难有60岁的权威，应为年轻人快速成长创造条件。”56岁时，他正式要求退出“一线”，由年轻才俊主持研究室工作，为青年人才提供平台和机遇，让他们站在自己肩膀上实现其才华。王选助推青年人才，给“化茧成蝶”作了生动注释。

能在某项科研领域攀登上事业巅峰，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是件幸

事。但历史高峰永无止境，“开创”和“领先”都是暂时的，只有一棒接着一棒跑，科技创新之树才能常青。在科技创新领域，不仅应聆听新声音，还得勇于托举后来者，助推青年人才“化茧成蝶”。所谓“化”，既是“点化”和“托举”，也是“融入”和“奉献”。不为既得名利所累，顺应新陈代谢规律，把个人理想和追求融入科技事业持续前行的长河中，才能有此情怀、有此境界、有此品格。

自2000年白川英树获诺贝尔化学奖，到2016年大隅良典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，日本在自然科学领域获诺贝尔奖人数已达到了15人，居全球第2位，仅次于美国。其中有种现象尤其值得关注：继承前辈的研究成

果，学生收获诺贝尔奖。梶田隆章获得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后说：“虽然我的名字最终上了获奖者的名单，但这不是仅凭我个人力量能够完成的研究。我的老师——东京大学特殊荣誉教授户塚洋的功绩更大。”仁科芳雄被誉为“日本现代物理学之父”，他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，但是两名学生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相继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足见，“成蝶”离不开前辈大师的积极“融入”和“奉献”。

2016年科学类诺贝尔奖得主平均年龄已超过70岁，上世纪前50年科学类诺贝尔奖得主平均年龄56岁。科学迅猛发展，研究领域日益细分，科学家数越来越多，科研发现也要经得起更长时间检验才能看清其价值，使得科学类

诺贝尔奖得主“老龄化”趋势愈加明显。这也意味着，科研领域必须更注重助推青年人才“化茧成蝶”。青年科学家是原创主力军，识才于成名之前，格外重视年轻科学家创造良好研究环境，才能形成“江河滔滔后浪接前浪，青山巍巍一峰高一峰”之势，赢得未来。

“化茧成蝶”知易行难。当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时，诸多权威人物就视其为“数学游戏”而群起攻之。或许这是把自家“一孔之见”当成了绝对真理，或许这是怕既得名利被动摇，有意无意间就成了新发现的抵制者，也成了后来人脱颖而出的阻碍者。

现实中还有种现象是“大树下面不长草”。老师变老板，师生攻堅科研沦为学徒为老板打工。如同“大树”把阳光都吸收了，“小草”

没了生气。要“化茧成蝶”，制度比慧眼和胸襟还重要。既要用好国内外同行评价机制，使更多天才能在竞争中“冒出来”，又要完善激励机制，给后来人以充分肯定和尊重。

据统计，从科研项目启动，到获诺贝尔奖，这个过程平均时间在15年以上。越是重大创新，越需要长期积累。因主客观条件问题，或许长期积累也未必有必然得之，但没有长期积累，则绝不会有偶然得之。欲“化茧成蝶”，就得拿出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精神潜心研究。像物体上升时最需要扶持一样，“化茧成蝶”就是个上升过程，自然也需要得到强力支持。年轻才俊能够守住寂寞潜心科研，前辈大师甘做“肩膀”，科技“高原”之上就会崛起更多高峰。

说法

我们对人工智能的了解，不要说产业界，就是媒体，其实对人工智能更多的认识是落在应用特性和娱乐特性上。如果我们只谈论应用和娱乐层面上的东西的话，我们是得不了图灵奖的，也得不了诺贝尔奖，也不能创造信息论这些东西。美国所谓原创性的研究，是从理论的根基出发，建立一套完整的思维方式，而有许多理论研究的东西是不会产业化的，没有产业化价值的。它只是一种哲学化的思考，而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关心。

—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、讯飞研究院院长胡郁

俄罗斯人、法国人、日本人、韩国人，他们和中国人一样，都在目不转睛地看手机。这是不可阻挡的一个潮流，算不上什么好事，也未必就是了不得的坏事，它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。因此，只是讨论应该不应该在手机上阅读，完全没有意义，可以进行一番讨论的也许只能是，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手机屏幕，究竟能读到些什么。手机阅读和吸食鸦片没有什么可比性，并不像媒体上认定的那样有害，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。手机阅读并不能表明读者的阅读兴趣有什么本质改变，手机屏幕只不过是更加形象、更加生动，同时又更加数据化地演绎了人们的阅读生态。

——作家叶兆言

一个农夫种出了特别好吃的葡萄，免费送给大家吃。可是，很多人都担心他有所图拒绝了，只有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，毫不设防，结果吃到了最甜的葡萄。生活的规则就是这样：拥有的越多可能会越提防着失去，而不设防的人有时才能遇到最好的惊喜。当人们长大后开始用理性去防范风险时，依然要有感性的心发现美好。如果一个人只长了头脑，就会理性到近乎冷漠，错过很多善和美；如果一个人只带着心，会善良到近乎愚昧。只有头脑和心灵结合在一起的人，才能思考这个社会。

——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研究院院长于丹

数字

8.5%

——自全面停止使用死刑器官以来，中国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。2015年全球器官移植约为12万例，中国为10057例，占全球总量的8.5%左右。与此同时，2015年中国器官移植者服用的抗排异药物量占全球总量的8%，与中国器官移植量的数据吻合。这给了污蔑中国“活摘器官”的造谣者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
过半省份

——《经济蓝皮书夏季号：中国经济增长报告（2015—2016）》认为，中国正式进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，有6个省份已成为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，即天津、北京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内蒙古。中国过半数省份人均收入为6000美元至11000美元，处于中等偏高收入阶段。

5分钟

——日前，国家卫计委首度推出“5125”健康生活理念，包括建议市民每天给自己留5分钟发呆时间；每天运动1小时、掌握1项运动技巧和加入1个运动社群；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，每周摄入25种以上食物。

漫画角



引进

丁安 绘

老话新聊

九月廿七风，懒妇掏家筐

桂晓燕

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农历九月廿七。旧时每逢这天，老宁波就会说这么几句老话：“九月廿七风，懒妇掏家筐。懒妇是介话，十月还有一个夏！”时令到了九月廿七，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“霜降”刚过，预示着冬季将要来临。这时候寒风渐起，气温骤降，懒妇不得不着手为家人赶制冬衣，于是匆匆忙忙去掏“家筐”里放置的针头线脑、尺子剪刀之类。懒妇心态挺好，她一面掏，一面自我安慰道：急什么呢？又勿会冻煞咯。十月天气还会回暖，到时候像夏天一样热哩！

大概是因为她直到天气转冷才开始动手，所以被人讥为“懒妇”。其实懒妇也有懒妇的难处，啊呀，实在是太忙了！旧时妇女承担的家务劳动之繁重，一定超出现今许多女孩子的想象。要知道，那时候既没有煤气灶，也没有自来水，一般人家更没有代步工具。烧饭用的是柴火灶、煤饼炉；洗涤用的是井水、河水；出门乘的是两条腿的“11号车”。作为家庭主妇，火要生，柴要劈，水要提，米要背……还要发挥高智能全自动不用电的“吸尘

器”、“洗衣机”、“缝纫机”等等的功能，每天忙得“吃饭吞，走路奔”，像个陀螺团团转。

好了，今天“懒妇”终于开始她宏伟的“冬衣工程”了。这个时候做衣服，其实是准备过年的行头。以前人们普遍收入不高，布票又有限制，一年到头难得添件新衣裳；但是过春节是必须焕然一新的，这叫做“正月正，新新衣裳穿身上。”之所以称其为宏伟的“工程”，是因为工作量确实非常大。那时候几乎没有现在最常见的这种三口之家；多数家庭三代同堂，孩子好几个；又不作兴买成衣穿，一家大小六七人甚或十来人的衣服，就靠女主人一针一线缝出来。正像儿歌《囡囡宝》里唱的那样：“囡囡宝，依要啥人抱？我要阿爸抱！阿爸出门赚元宝。囡囡宝，依要啥人抱？我要阿姆抱！阿姆纺花做棉袄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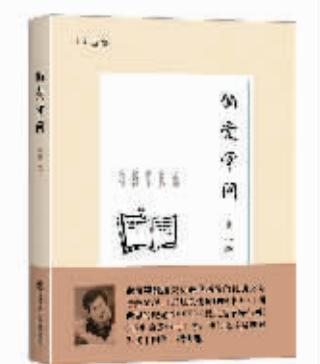
都说宁波人聪明能干，宁波的“红帮裁缝”名扬天下；没有学过裁缝的宁波“阿姆”们，也个个无师自通。都说上海人脑子“哈灵”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上海城隍庙商场推出了一种牛皮纸做的衣服纸样，男女老少的四季衣裤一应俱全，与实物的比例为一比一，是裁剪衣服时“依葫芦画瓢”的理想

“葫芦”，这也帮了不少宁波“阿姆”的忙。

不过，这些衣服纸样虽然品种齐全，使用方便，式样却很单调。因为当时穿衣服也讲“革命化”，全国人民高度统一，谁如果与众不同，那就是奇装异服，是绝不容许的。您听听这段顺口溜怎么说：“阿飞阿飞真犯关，小脚裤子花背单。阿飞飞得高，我有高射炮；阿飞飞得低，我有滴滴涕……我擦起铁扫帚，把阿飞扫到阴沟里！”为什么叫他“阿飞”？阿飞为什么“犯关”？原来他竟敢穿“小脚裤子花背单”！你的裤脚为什么小于6寸？你的“背单”为什么要“花”？对你这样的“阿飞”，当然是毫不留情，无论飞到哪里，都打得你落花流水！

时至今日，习惯于在淘宝网上“衣来伸手”的小宁波们，既不必九月廿七掏家筐，更不必担心裤脚被剪破，买衣服随心所欲，穿衣服自由自在。簇簇当年的“懒妇”和“阿飞”！老宁波们也不甘落后，与时俱进，一改年轻时不是“白加黑”、就是“灰太狼”似的暗淡形象，穿上了丰富多彩、美观得体的时装，显得精神几分、年轻几岁！不管是老宁波还是小宁波，都要加倍珍惜这样的日子哦！

社科书架



《偏爱学问》
俞可平 著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2016年8月

俞可平曾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，现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、讲席教授，政府管理学院院长，是中国民主治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。他倡导的“治理”“善治”“社会治理”“全球治理”“官民共治”“增量民主”“政府创新”“动态稳定”“协商民主”等理念影响深远、广受关注。本书是俞可平教授回归北大讲台后的首部文集，从“尘世的学问”到“天国的学问”，收录了《通过关键词理解中国》《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》《民主是个好东西》以及《历史偏爱学问》等多篇代表作。

俞可平“品学问” 品出了些什么？

朱晨凯

作为学者型官员的代表人物，俞可平在从政时就已著作等身，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了十多年副局长后，他于年底离职回到北京大学潜心学术研究。这本书正是他在这个时期著成，取名为《偏爱学问》，生动地表达了俞可平纯粹的知识追求与人生态度。本书分五个部分：看中国、谈政治、谈民主、论治理和品学问。读完此书，相比前面四个部分的内容，笔者认为“品学问”这个部分更值得推荐给读者，毕竟就俞可平的经历而言，官场“转了一圈”再回归校园“品学问”，这“品”出的东西，一定蕴含着许多不一样的感受。

俞可平认为，要“品”的学问是两种：一种是应用性的对策研究，一种是抽象的学理研究。他把这两种学问叫做“尘世的学问”和“天国的学问”，认为应用性的对策研究的学问为“尘世的学问”，而抽象的学理研究是“天国的学问”。“品”这些学问的前提，是认识到“学术理性”与“政治理性”的关系——存在矛盾但又难分难舍。他认为纯粹的学问与现实的政治之间存在难

以跨越的鸿沟、难以调和的张力。就像俞可平在本书自序中写到：“我清楚地知道，政治的理性与学术的理性难以调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政治与学术的差距总是那么巨大。但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，我却总想把两者集于一身，试图努力以学术的理性去追求政治的理性。”但俞可平也承认，两者是难分难舍的，他表示自己回到北京大学之前，除了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应用研究上，更多地还是以学术的而非政治的眼光去分析现实问题。

在面临为官和治学的选择时，为何选择“品学问”和“偏爱学问”？俞可平认为，“偏爱学问”除了个人喜好，背后也有一些历史规律。书中收录的《历史偏爱学问》这篇文章，就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俞可平举了个例子：中国历史上总共有过332位符合法统登基的皇帝，408位正式称帝的君王，但现在人们能够记住的皇帝就那么几位。人们更多记住的是孔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孟子、孙子、荀子、屈原、司马迁、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王安石、苏东坡等。造成这种现象，根源还在于传统观念“偏爱学问和思想”，由于传统中国奉行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士大夫制度，



本书作者是美国西北大学教师尤拉·比斯。她发觉人们实际上是无法让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“对这个世界免疫”，于是她开始了一场针对“免疫”的细致的调研。本书是她研究内容的集结——谈信任问题，谈舍问题，谈科学的可贵，以及人们有时候的急功近利。



作者马克斯·韦伯是德国社会学家，现代社会学的创立者之一。本书浓缩着韦伯学术思想的精华，也由于他作为当时一名“精神贵族”式的德国知识界领袖，对其身边的思潮做出了十分个性化的回应。

(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店提供)